

影響、相互作用與本地化

——2018年“基督宗教在中國”會議綜述*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A Review of the
2018 Confer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意】羅木蘭著 趙琳譯
[Italy] Monica ROMANO

作者簡介

羅木蘭，宗座額我略大學傳道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onica ROMANO, Lecturer,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Italy.

Email: monicaromano111@gmail.com

Abstract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over time Christianity has interacted with the existing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ethical systems while attempting to indigenize and “sinicize” itself through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inculturation, not without raising questions and posing challenges. Today, Christianity is among the fastest-growing religions in China but continues to be largely perceived as a “foreign religion,” despite its long history in the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held at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on 22-23 March 2018 discussed these issues. 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Missiolog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Yuan Dao Study Center and of the Gregorian University Foundation, it gathered schola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various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nelists debated the them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historical, religious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through a dialogical approach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teracting with an audience including researchers,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government officials, journalists, religious people, and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This review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main ide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which was the eighth in a series of annual conferences on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main aim of this kind of symposium was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dialogue between academia, church leadership and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Keywords: Christianity, Catholic Churc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religion

自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各大宗教在中國的復興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研究興趣。自唐代傳入中國以來，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歷程伴隨着問題與挑戰，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基督教與中國既有的哲學、宗教與倫理體系（包括儒家思想、道教、中國佛教以及鬼神和祖先崇拜的“中國民間宗教”）互動，同時通過適應和文化融入的方式努力將自身“本土化”與“中國化”。時至今日，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是中國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但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仍然有限。儘管基督教在中國有着悠久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被認為是一種“外來宗教”。

2018年3月22日至23日，“基督宗教在中國：影響、相互作用與本地化”（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國際學術會議在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行，該會議提出和討論的主題涵蓋了上述所有問題。會議由額我略大學傳道學院（Faculty of Missiology）主辦，香港原道交流學會和額我略大學基金會協辦。該會議匯聚了來自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和歐美各國的學者和宗教領袖。論壇成員們從歷史、宗教和社會學的角度，通過東西方對話的方式圍繞基督教在中國的主題展開討論，並與研究人員、外交代表、政府官員、記者、宗教人士以及額我略大學師生交流互動。該會議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舉行的“中國社會的基督教信仰”系列研討會的第八次會議，旨在為學界、教界、政府及中西學者之間搭建一個對話平台。

會議第一天，額我略大學校長貢薩爾維斯教授（Fr. Nuno da Silva

* 本文為早前以意大利文和英文發表的兩篇短文的增訂版本。[This is a longer version of two shorter articles published earlier in Italian and English, namely: Monica Romano, “I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mpatto, Interazione e Inculturazione,” *La Gregoriana*, Anno XXIV, no.54 (2019):10-15; and Monica Romano,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La Gregoriana Magazine*, Year XXIII, Special Issue, no.53 (2018):24-26.]

Gonçalves) 及傳道學院院長屈斯特教授 (Fr. Milan Zust) 致辭歡迎與會嘉賓，羅馬宗座外交部長拉加格爾總主教 (Archbishop Paul Richard Gallagher) 及香港榮修主教湯漢樞機主教 (Cardinal John Tong Hon) 為開幕主講嘉賓。拉加格爾總主教在演講中讚揚了中國在國際舞台和全球化進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中國為消除貧困所做的努力，並對耶穌會士為重新發現中國文化所做出的“非凡貢獻”表示“深切欽佩”。拉加格爾總主教表示，中國教會的使命是通過信仰的文化適應和融入，“使‘基督教世界’和‘中國世界’之間的相遇成果累累，讓教會成為“完全天主教的和真正中國化的教會”。湯漢樞機在演講中強調，中國社會和基督宗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群體，各自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二者間的對話不可或缺。湯漢樞機認為，對話、尊重、相互傾聽和相互走近，有助於“互相充實”“社會和諧”“和平共處”，以及增進“對世界、對生活、對社會的新認識”。

在第一天上午的論壇中，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慧林教授以荷蘭漢學家許理和 (Erik Zürcher) 的研究成果為基礎，詳細闡述了佛教和基督教這兩個非本土宗教在中國的不同發展路徑。許理和比較了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融入情況：佛教慢慢地融入了中國文化，而基督教至今在中國被認為是一種外國宗教。對此問題的兩個“流行”解釋是：這是因為禮儀之爭重創了基督教在華傳教工作；或者是法國漢學家謝和耐 (Jacques Gernet) 的觀點——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不相容。許理和不同意這兩種簡單化的觀點。他認為這兩種宗教在中國的不同遭遇和結果是因為它們在中國有不同的傳播方式：佛教採用了“自發擴散” (spontaneous diffusion) 的傳播方式，而基督教是“指導性傳播” (guided propagation)。楊慧林教授點出了這兩種傳播方式的差異並進一步指出，佛教與儒家思想在中國積極互動、相互影響，以玄奘為代表的中國僧人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中國介紹和改寫經文，這些對佛教在中國的有效傳播有重要幫助。來自海德堡大學的李克教授 (Marco Lazzarotti) 在回應中對此做了更多補充。他認為，佛教與中國

的本土宗教和民俗有很多互動；而基督教傳教士則更多與自己的母教會、教會領袖及身在歐洲的教宗保持密切聯繫，並且不同教會的不同立場催生了各種不同的福音要旨（“kerygma”），造成分裂。這些都導致基督教與佛教相比在傳播上未能取得有效成果。

在接下來的論壇中，來自復旦大學的魏明德教授（Benoit Vermander, S.J.）談到中國領導層在海外引發爭議的倡議——“宗教中國化”（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魏教授認為這一相對模糊的概念具有其文化和社會政治意義，但是基督徒不應該僅僅因為這個建議來自政府而拒絕它，而是應該找到恰當的方式，積極回應、參與對話。魏明德教授強調，中國基督教信仰的“書寫、社會和儀式表達”自17世紀開始就經歷中國化的進程，其間伴隨着大量的跨文化和跨宗教對話。不過，魏明德教授重申了此前的觀點，即基督教在中國仍被視為一種“異端”，因此中國的基督教需要通過遠離“自衛態度”（defensive attitudes）變得“更中國化”；放棄任何形式的殖民主義文化；在與儒家、道家傳統的對話中進行“精神文化融合”；通過藝術和文學與文化進行對話；並致力於更多的社會服務和行動。北京大學彭小瑜教授在回應中指出，中國人對基督教普遍的負面態度在中國出現共產主義之前即存在，這應該歸因於中國的精英學者們接受教育的西方文化環境。這些環境經歷了去基督教化的過程，以科學和現代的名義反對基督教並敵視社會主義，這種環境塑造了今日中國中產階級的心態，也使許多天主教徒在社會問題上陷入保守立場。

北京大學盧雲峰教授的論文涉及了中國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數量問題。這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話題，有着“複雜的政治和宗教考量”。他認為，雖然來自政府的信息可能會傾向於壓低數據，但教會或一些海外團體更有可能會誇大數字。各種來源估計中國有兩千萬到1.3億新教徒。盧雲峰教授的演講結合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結果，主要介紹了北京大學開展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該調查問卷中設計的問題不是固定答案，而是可以有多種答案，但同時為特定的宗

教定制了與其宗教活動相關的問題。這樣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新教人口約為3800萬人。額我略大學的約翰內斯·埃拉特教授（Johannes Ehart, S. J.）在回應中承認此類調查提出了一些挑戰。他指出定量社會研究存在局限性，甚至是模糊性，並指出問卷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受洗是被認為是基督徒的唯一標準；宗教實踐與宗教機構的關聯；亞洲宗教經驗的多樣性和非排他性；和“無宗教”類別等。

在第一天的最後一個論壇上，來自倫敦大學的彼得·勞曼教授（Lars Peter Laamann），挑戰了自“五四運動”興起的一種“單一的、‘愛國的’和‘科學的’反對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主流觀點。雖然外國傳教士的確被中國知識精英視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勞曼教授認為因為傳教士具有“技術知識”和“治病”的能力，大多數人其實是信任他們的。人們對傳教士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或認為他們是“異域的魔術師”，或欣賞他們的“醫學特長”。上海復旦大學的李天綱教授同意這一看法，認為反基督教運動在中國更多的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結果，並認為中國學者應當“重新評估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用”。

第二天上午的論壇以哥德堡大學的楊富雷教授（Fredrik Fällman）的報告開始。楊富雷教授從社會-政治、文化-知識和實踐-傳教的三個角度討論了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的互動問題。他指出，儘管中國一直控制宗教的體制，中國宗教在近幾十年內還是獲得了一些發展空間。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堅持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最近又倡導宗教“中國化”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神學”。這些要求旨在讓宗教與“黨一國”所定義的“中國性”“一致”，讓宗教“淡化”為一種“道德化的信仰”。雖然適應是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強制要求”，但也為基督徒與中國社會的互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四川大學的石堅教授辨析了“適應”（adaptation）“本土化”（indigenization）“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中國化”（sinicization）這四個常與本土化問題相關的關鍵術語，其中“中國化”是最近在“學界、政界與宗教界”被廣泛使用的術語。石堅教授表示，“基督教還沒有很好地融入中國文

化和社會”，這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擔憂，其外來身份和因信教而產生的大量異端邪教被認為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副院長楊曉亭主教在演講中結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以及《天主教會社會教義概要》 (*Compendium of the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介紹了中國天主教教會社會服務工作的發展，包括其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楊主教強調，社會服務幫助天主教會參與中國現代社會並發揮一定的作用和影響；讓教會適應社會主義社會、融入中國文化並獲得國家的認可。明斯特大學的克勞迪婭·馮·科拉尼教授 (Claudia von Collani) 在回應中探討了16至18世紀中國人的需求以及歐洲基督教對這些社會需求的回應。她指出，當時的耶穌會士引進了與科學技術相關的知識，開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相適應的過程。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也製作了大量的宗教書籍，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社會服務。

華盛頓大學的魏楊波教授 (Jean-Paul Wiest) 回溯了基督教在中國經歷的文化本土化歷史過程，這個不斷適應的過程從早期與東方敘利亞教會的互動開始延續至今。他指出了一些幫助基督教融入文化和傳播的因素，即在當地社會網絡中出現了本土傳教士；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村民之間建立了和平關係；基督教強調寬恕和憐憫；建設天主教教育機構；在基督教靈修中加入中國宗教實踐元素；以及基督教藝術和建築本土化等。魏楊波教授認為，社會服務、對新聞和數字技術的利用、訓練有素的平信徒、與中國的政治形勢“達成共識”、以及“中國化”(只要它包含“同化”中國傳統，達到“多元化和寬容”)是當代天主教發展的前進道路。山東大學傅有德教授在回應中強調，中國宗教確實與西方不同，它必須服從於政府。這並不意味着政府會干擾“純宗教事務”，而是政府和教會共同實踐“愛國愛教”的原則。傅教授將教宗方濟各關於文化多樣性和本土化的必要性的講話定義為“好消息”，認為這可以指引基督教走向“中國化”。

香港天主教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吳智勳教授全面而深入地介紹了基督教中國化過程，並着重介紹了成功的故事和錯失的機會。他明確指出，基督教信仰要在中國扎根，文化融合至關重要。基督教在中國經歷了接受和拒絕的不同階段，後者往往是由於它被認為與外來的帝國主義有聯繫。只要基督教與中國的精神和倫理傳統對話，使自己適應中國的文化背景，同時呈現基督教的核心和普世信息(上帝的仁慈、愛和拯救的力量)，它就可以在中國人中間結出果實。吳教授認為基督教參與中國的主要“成功因素”是掌握了中文知識和尊重當地文化。耶穌會士撰寫了大量著作，尋求與儒家思想在道德方面的共同點。與此相反，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包括傳教士缺乏漢語能力和中國文化知識、在舉行宗教儀式和培訓神職人員時僅使用拉丁語、本土神學未能得到發展等。為了推進基督教在今日中國的本土化，天主教會應該參與宗教間的對話，鼓勵平信徒參與福音傳播，強調道德倫理和愛，宣揚上帝的“仁慈的救贖”。額我略大學講師羅木蘭博士(Monica Romano)在回應中指出，外國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遵循中國成熟的文本實踐，在文本中國化的過程中做出了貢獻。這一過程隨着中國基督徒的參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它也可以被視為中國神學發展的第一步。“基督教信仰的存續”包括很多因素：強大而富有活力的、扎根於農村的基督教社區；教會由下而上的本土化；以及與來自民間信仰的當地風俗融合等。當代中國天主教會的首要任務是強調以聖經為中心發展中國神學，開展普世教會和宗教間對話，與學術界和研究機構對話，宣揚和見證愛與恩慈的福音。

譯者簡介

趙琳，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編輯。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Lin, Associate Edit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olin1228@outlook.com